

研究論文

# 「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批判媒介素養與傳播賦權

邱林川

## 摘要

工人與新聞媒體如何發生關聯？何為「工民新聞」？如何在基層工人中利用參與式行動研究開展批判媒介素養活動？本文介紹深圳工業區的一個工友新聞興趣小組，其活動包括剪報、座談、新聞採編等多種豐富的「工民新聞」形態，以達到傳播賦權目標。之所以叫「南方兩週末」是因為工人們隔週在週末舉行活動。本文通過回顧該新聞興趣組的實踐情況，聯繫參與行動、批判媒介素養、發展新聞學等方面研究傳統，反思涉及的問題與影響賦權效果的因素。文章還將集中回顧三個真實的活動環節，分別涉及工友發聲、工人新聞的發展、以及與商業媒體的互動，並在此基礎上總結該參與式行動研究項目的經驗教訓，供未來借鑑。

**關鍵詞：**參與式行動研究、批判媒介素養、發展新聞學、新聞教育、傳播賦權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興趣：信息傳播技術、階級、全球化及社會變遷。電郵：[jacklqiu@cuhk.edu.hk](mailto:jacklqiu@cuhk.edu.hk)

論文投稿日期：2014年7月1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5年1月22日。

---

Research Article

## **“Southern Bi-Weekend”: “Worker-tizen Journalism”,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nd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Jack Linchuan QIU

---

### **Abstract**

How do workers relate to news media? What is “worker-tizen journalism”? How ca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nd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ctivities be carried out among worker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workers’ news study group located in an industrial district of Shenzhen, South China, where factory workers were organized to do news clippings, group discussions, as well as conte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for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The study group is called “Southern Bi-Weekend” because workers gathered every other weekend. Activities of this project are introduced, its methodological issues discussed, especially regard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al journalism. The three focal points of discussion are the workers’ voices, the growth of workers’ new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commercial media, leading to general lessons learned fo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

Jack Linchuan QIU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eputy Director). Centre for Chinese Media and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social clas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Keywords:**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developmental journalism, journalism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Qiu, J. L. (2015). “Southern Bi-Weekend”: “Worker-tizen journalism”,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and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4, 151–184.

## 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工人階級是國家領導階級。工人與新聞媒體如何發生關聯？在中國進行新聞傳播研究，這問題恐怕是基本問題。「移民、傳播與賦權」項目組沿此思路，走入深圳龍崗區橫崗鎮189工業區，從2009年3月到2011年4月，隔周開展工友新聞興趣組實踐。活動內容由初期剪報、座談，發展到後期工友採編、內部發行報紙，還涉及多媒體內容製作，呈現出豐富的「工民新聞」形態與社會功能，為在工人群體中開展新聞教育及傳播賦權活動提供了難得的樣本。

由於活動在每隔一周的週六或周日舉行，參加活動的工友又比較喜歡討論《南方週末》，所以大家在2009年11月討論決定，將該小組命名為「南方兩週末」，其宗旨是：「讓工友了解真實的世界，讓真實的新聞為工友服務！」

本文通過回顧「南方兩週末」新聞興趣組兩年多的實踐活動及其傳播賦權情況，包括所涉及的方法問題，特別是批判媒介素養、發展新聞學、和參與式行動研究等方面，同時總結經驗、反思教訓。文章還將集中回顧三個真實的活動環節，分別涉及工友發聲、工人新聞的發展、與商業媒體互動及其中暴露的問題。

## 研究脈絡與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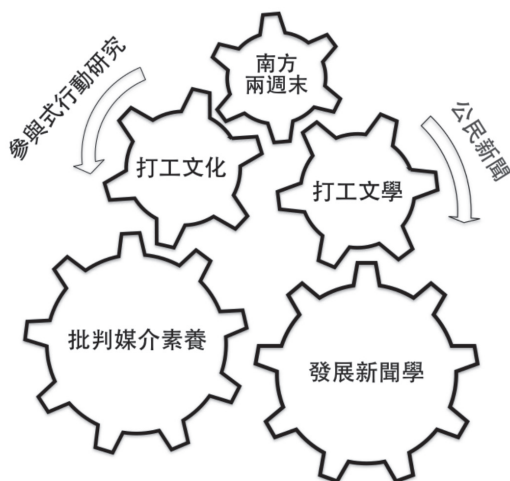
涉及工人與新聞媒體的研究多採用兩種途徑：一看工人擁有甚麼媒體、接觸甚麼媒體、怎樣使用媒體，把工人看作新聞消費者，與其它消費群體相比主要在接入形式和消費能力上有差異(Qiu, 2008；楊善華、朱偉志，2006；周葆華、呂舒寧，2011)。這種研究有的通過個人或小組訪談，也有的通過參與觀察進行資料搜集，最常見的是進行問卷調查，如中國綜合社會基礎調查CGSS(李培林、田豐，2011)採用大樣本，隨機抽樣，發現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及其他社會群體之間，在媒體擁有和使用上存在顯著差別。

另一途徑是內容分析、文本分析或話語分析，主要看工人在媒介

內容中如何被再現，包括新聞呈現的工人形象，也包括娛樂節目及其它影視作品如何表現工人(曹越、劉慧丹，2006；康美齡、謝曉霞，2011)。其特點是把工人看作媒體生產的客體或被表現的物件，如電影《鋼的琴》裏的下崗工人形象(承鋼，2012)、央視春晚小品中的農民工形象(聶寬冕，2010)。

兩種研究都很重要卻仍不全面。消費形態也好，媒介再現也罷，均是相對靜態的，且對工人與媒體的關係存在兩點假設：一來工人與媒體相互分離，兩者間存在清晰的主客體界線。二來工人是個體的、被動的。他們只是在記者編輯意圖框架下「消費」新聞，或是只能「被表現」。針對這些不足，「移民、傳播與賦權」項目組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設計，如運用民族誌教學法參加北京皮村的「新工人藝術節」(卜衛，2010a)。在深圳189工業區進行「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實踐，也出於類似想法，希望通過開展以工人為主體的新聞媒體相關活動，達到在工人群體中提供媒介素養教育和傳播賦權的雙重功效。

圖一 「南方兩週末」項目設計主要概念及理論聯繫



圖一是本項目的總體概念設計框架。「南方兩週末」新聞興趣組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和公民新聞的工作方法，直接從華南地區打工文化

和打工文學傳統中發掘資源，包括組織形式。更深層的項目理念則來自批判媒介素養及發展新聞學的理論概念和學術實踐傳統。下面就這幾方面分別梳理其歷史脈絡及具體內容。

為底層民眾服務的新聞傳播研究一般可追溯到上世紀中葉的發展傳播學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和發展新聞學 (developmental journalism)。受冷戰影響，當時服務對象主要不是工人，「發展」專案甚至有意排除工人參與、壓制工人聲音，而將主要精力放在農民、婦女、少數民族、難民、貧民窟青少年等身上，特別在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衣索比亞 (Servaes, 2008; Sparks, 2007)。強調「發展」，意思是要新聞媒體提供滿足服務對象長期生存發展的基本信息與服務，如健康知識、農耕技能、普法、掃盲、提倡性別平等，也包括幫助底層民眾建立自信，走上民主道路。彼時冷戰伊始，資源由美蘇兩大陣營控制，所以工作方式強調專家介入，較少讓底層民眾真正發聲，對外依賴較強 (Kapoor, 2008)。

進入1960年代，發展研究得到不少新興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特別在拉丁美洲，一批有識之士用新的理念方法為貧苦百姓尋求文化和傳播上的解放，並將這種解放看做民族獨立、階級抗爭的重要內容。比如弗萊雷 (Paulo Freire) 提出「被壓迫者的教育學」(2001)；薩比多 (Miguel Sabido) 在系統調研的基礎上運用肥皂劇為底層人群服務等 (Singhal & Rogers, 1999)。由此，發展研究開始擺脫教育及媒介系統由錢權操縱，自上而下灌輸發展理念的早期局限，轉而看重自下而上的力量和底層民眾間的平等交流。如弗萊雷所說：「解放：不是一種恩賜，也不是一種自我實現，而是一個互動的過程。」(2011：1)

如此來看，行動研究者必須「和」受壓迫者一起從事賦權活動而非「為」受壓迫者解決問題。該觀念成為後來「批判媒介素養」(台灣翻譯「批判媒體識讀」)運動的起點(成露茜、羅曉南，2005)。近年來採用此類參與式行動研究的項目在各國依然時有出現，如烏干達傳播發展基金會(CDFU)開展的旨在提高性別平等意識的African Transformation視頻項目(Underwood et al., 2011)及法茲·烏拉(Faiz Ullah)在孟買和德里開展的工人傳播賦權項目，但總體而言參與式項目受制於跨國組

織和國際基金會等官僚機構，從而不再像70、80年代那麼風靡一時 (Sparks, 2007)。

中國早在上世紀初就有蔚為壯觀的鄉村教育運動和工人教育運動 (祝彥, 2009; 劉建華、潛偉, 2006)。至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運用「群眾路線」，發動普通勞動者參與新聞生產，例如《解放日報》的「通訊員」系統 (王維佳, 2011: 42-43)。在政治訴求和組織方式上，「通訊員」制度與鄉村教育運動及發展新聞學不盡相同，但在內容上亦有相通之處，如強調識字掃盲、克服城市精英偏見。此外當時傳播手段有限，手寫或印刷媒體往往成為各種基層教育運動的重要一環。例如剪報在70年代以前的香港工運組織中就已很常見。

80年代以來，關於傳媒與社會發展的國外文獻進入中國，有以勒納、施拉姆為代表的現代化學派 (韋爾伯·施拉姆, 1990)，有包括弗來雷《被壓迫者的教育學》的批判學派，也有來自印度的「娛樂教育 (entertainment-education)」和孟加拉的「格萊珉」模式 (穆罕默德·尤努斯, 2006; 羅鳴、張立偉, 2010)。幾種傳統，除現代化學派外，均在不同程度上強調底層賦權或行動研究 (Sparks, 2007)。

更重要的是，隨着打工群體迅速壯大，工人群體內部出現了豐富的新型媒體文化實踐 (張一文, 2012; 楊宏海, 2007)。它們多從當地問題出發，借助組織渠道或是個體、小群體的情感體驗表達，其中不乏集體創作、集體抗爭、集體訴求。這包括80年代《佛山文藝》、90年代深圳《大鵬灣》等打工文學雜誌，以及大量湧現的打工詩歌、打工小說、打工歌曲，也包括90年代風靡全國的電視連續劇《外來妹》 (楊宏海, 2009)。

新世紀以來，在北京、廣東、江浙等地又湧現出「新工人」文化現象。它填補「我國文化生產在滿足底層人群的文化需求方面」的空白，「同時彰顯著明確的價值立場，即：以底層打工者的立場，創造文化、記錄自身的歷史，呼籲全社會關注打工者，維護打工者的權益。進而通過文化創造實現自我肯定、自我成長，以文化重造改變打工者形象」 (劉忱, 2010: 24)。它不同於過去工人從大眾媒體學習現代生活，過程中參與媒體和文化生產的自覺性較低，同時受制於商業媒體運作 (馬

傑偉，2006)。與之相對，新興打工文化要「由起初的『被文化』發展到『自己搭台、自己唱戲』，大力宣導『打工最光榮，勞動最高尚』……這些處於勞動者底層的農民工，不僅在自己的創作中修復、創建着勞動文化，也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自我肯定、自我發展，重塑了勞動地位」(溫鐵軍、劉湘波，2010：33)。

從發展新聞學到打工文學，再從批判媒介素養到打工文化，始終貫穿着兩條主線。一是底層工人的文化主體性，二是進行主體表達的傳播渠道與媒體平台。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落實第一步是要加入工人群體，開始行動，即開展參與式行動研究(卜衛，2010a；林志彬、張立新，2010)。行動研究是發展傳播學發端之初就有的重要傳統，近年來隨着新型傳播媒體普及，更在全球範圍內衍生出「信息傳播技術與發展(ICTD)」等新的行動研究領域(Hearn, Tacchi, Foth & Lennie, 2009; Unwin, 2009)。

然而，在國內，類似的參與式項目並不多見，主要是中國社科院卜衛、復旦大學周葆華、深圳大學丁未所主持的三個項目組已開始進行類似嘗試，雖其涉及工人群體和傳統媒體新聞之間關係的研究成果至今公開發表出來的仍然不多。如前所述，國外此類項目也絕非主流，這應與以下兩點有關：一、受到冷戰及其遺產的影響，媒介素養教育在各國行動實踐與學術脈絡中往往和勞工議題存在隔離。這方面，內地因其社會主義傳統，受到的負面影響反倒較少。台灣更是例外，因其媒體識讀運動從初期就與勞工運動形成較好的結合，當年也有《立報》這樣的成果(成露茜、羅曉南，2005：279)。二、新自由主義氾濫令各國基層社區活動萎縮，不但經費減少而且決策過程日益不民主，包括社區教育和社群媒體運作均受影響(Brady, Schoeneman & Sawyer, 2014)。內地老工人社區文教活動空間萎縮，新工人社區媒體資源缺乏，只能依賴互聯網發展自行發展，而非直接要求當地政府投入(王洪喆、邱林川，forthcoming)，這與全球新自由主義影響社區發展的大趨勢是一致的。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兩週末」實踐活動也屬公民新聞範疇。所謂公民新聞，是讓普通民眾進行新聞生產，而不再依賴新聞專業人員提供公眾需要的信息和觀點(Allan & Thorsen, 2009)。自從出現互聯



網博客、播客，公民新聞成為時髦的詞彙 (Gillmor, 2004)。但在工人報導的傳統裏，其實列寧主義新聞學就已提倡讓普通工人當「通訊員」(Downing, 2001)。具體到工業區，這裏的公民就是工人，他們參與活動不是簡單消費主流報刊，而是從自身經驗和視角出發，對媒體內容進行挑選、評論、改造，並在日益變化的多媒體環境裏，根據實地情況，開展草根公民新聞活動，成為「工民記者」。

## 項目活動

2007年3月，「移民、傳播與賦權」項目正式啟動。首先準備文獻並開始接觸工人組織。經過一段摸索，通過「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卜衛, 2010b)，我們與深圳的X中心建立聯繫，並於09年1月首次走訪他們。當時中心工作人員提出希望協助成立「工人剪報組」。我們於是開始準備。值得指出的是，該項活動並非單純應中心之邀的偶然決定，而是基於項目組對參與行動研究和批判媒介素養理論及方法的理解，以及我們對當地工人傳播需求狀況的基本認識。這在下面會進一步說明。

X中心成立於2003年，是華南工人文化建設的重要機構，其活動與其它珠三角農民工組織基本無異(黃岩, 2008)。中心提供勞動文化、法律法規等工人群眾急需的服務，並設有圖書室供工友免費使用。圖書室除了書籍，還有報紙雜誌。由於報紙堆積很快，中心無法長期存放，所以多數過期報刊作為廢紙賣掉，只有極少數內容被剪出來，貼到公告板上或剪報冊裏。然而，剪報工作缺乏分類，也沒有工友參加，常常想找以前的有用報導，卻找不到。

中心有5、6名工作人員，他們在中心全職工作並獲得工資。每天來使用該中心的工友人數從幾十到幾百人不等，包括義務幫助開展活動的「義工」。參加「南方兩週末」的工友多數是義工(參與人員概況見附錄)，除了個別參與的中心工作人員，以及外來的實習生和研究者。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始終負責新聞興趣組內部協調的寶麗。她來自福建，以前是電子廠工人。

表一 專案發展過程及主要活動

08年6月	與X中心初步接觸
09年1月	首次走訪中心，開始籌劃剪報組
09年3月22日	剪報組正式成立，請石炳坤師傅培訓
09年3-6月	完成修改剪報分類，固定基本流程和分工
09年3-4月	新聞摘要練習
09年5月	新聞評論：「工友眼中的經濟危機報導」
09年6-7月	新聞媒介史、新聞理論簡介
09年10月-10年5月	龍城康復醫院調查報導及跟進，並製作片花
09年11月29日	改名「南方兩週末新聞興趣小組」
10年2月	座談會「真假之間」
10年8月	南都記者座談會
11年1月	工人晨練隊報導
11年4月	新聞群組與文學組合並，《工錄》創刊
11年5月	因X中心搬遷，新聞興趣組活動暫停

2009年3月22日「工人剪報組」正式成立。首次活動由香港工人石炳坤師傅——「炳坤叔」——介紹他自1980年以來的剪報經驗，有十多名工友參加。與香港公益組織合作是珠三角民間組織常見的情況(朱健剛, 2007)。炳坤叔介紹他的剪報理念和九類分類系統，特別是如何在報刊中挑選新聞：一是「相關性」，即新聞內容與工人工作生活及工友關心的問題有緊密關聯；二是「規模大」，涉及人數多、影響面廣；三是「新」現象、「新」變化，提供大家不知道的信息。其中「相關性」最根本，「規模大」和「新」只要符合一條就有剪報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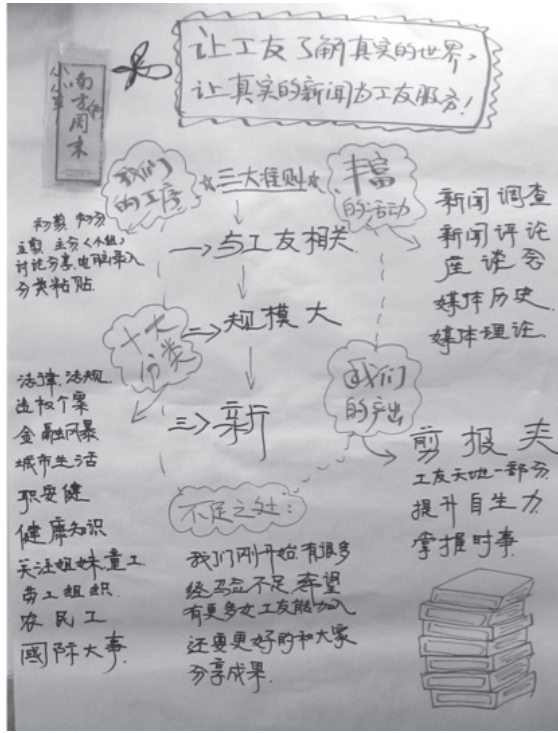
會後討論，工友們很受啟發，但覺得九類分得太細。經過一個月動手剪報練習，09年4月集體討論將九類合為六類，其中加入「金融風暴」、「城市生活」等新分類，並採用拼音首字母標注為每類剪報設立代碼，方便操作。這段時間恰逢金融風暴，當地經濟受衝擊，工友開工不足，於是把更多精力放到剪報上(Qiu & Kim, 2010)。分類體系多次修改後在09年6月確定下來，包括九大類十三小類(見表二)。和香港工人的分類體系相比，此分類系統其實更複雜，但大家卻覺得更易使用，因為它是集體參與行動的結果。

表二 「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剪報分類體系的建立

香港工人的剪報分類 (2009年3月)	經合併的剪報分類及代碼 (2009年4月)	最後確定的剪報分類及代碼 (2009年6月)
一、勞動糾紛	一、法律法規(F)	一、法律法規：法律法規(F)、維 權個案(G)
二、婦女童工	二、金融風暴(R)	二、金融風暴(R)
三、工會與NGO	三、城市生活(C)	三、城市生活：企業管理(Cq)、社 會保障(Cs)、其它(C)
四、社會保障/保險	四、職業安全健康(Z)	四、職安健(Z)
五、法律法規	五、健康知識(J)	五、健康知識(J)
六、職業安全	六、關注姐妹(G)	六、關注姐妹童工：姐妹(Gj)、童 工(Gt)
七、農民工		七、勞工組織(L)
八、企業管理		八、農民工(N)
九、國際性		九、國際大事(GJ)

除了分類，小組還通過集體實踐確定剪報基本「工序」和分工（見圖二）。一方面，參與者分別負責不同報刊，包括全國性的《參考消息》、《安全生產報》、《中國婦女報》；廣東省的《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南方工報》；市級的《深圳特區報》、《晶報》（詳見表二）。另一方面，每位工友按挑選新聞三準則先從各自負責的報刊裏剪出報導，並按剪報分類體系進行初步分類。然後隔周大家討論這些報導是否重合、是否有不合乎剪報準則的。經討論確定有價值的報導，會有一個編號，如2009年6月的第11篇報導，編號20090611。再經小組討論確定屬於哪個類別。最後，大家將報導根據分類貼到資料夾裏，並將報導編號和所屬類別輸入電腦excel，方便查閱。

圖二 「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興趣組製作的活動簡介圖



圖三 「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剪報記錄表截圖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1	剪报记录表												
2													
3		F	R	Cq	城市生活	Z	J	Gj	Gt	L	N	GJ	
4	记录号	法律法规维权	金融风暴	企业管理	Cs 社保	C 其它	职安健	健康知识	关注姐妹	工童工	劳工组织工会	农民工	国际大事
5	0903001	✓			x								
6	0903002	✓		x									
7	0903003	✓			x								
8	0903004	✓			x								
9	0902001		✓									x	
10	0903005		✓		x								
11	0903006		✓										
12	0903007		✓										
13	0903008	✓			x								
14	0903009				✓								
15	0903010	x			✓								
16	0903011						✓			x			x
17	0903012							✓					
18	0903013						✓					x	x
19	0903014							✓					
20	0903015											✓	
21	0903016						✓					x	
22	0903017								✓			x	
23	0903018	x							✓				
24	0904001								✓				
25	0904002	x							✓				
26	0903019							✓				x	
27	0903020												
28	0904003	x							✓				
29	0903021	✓											
30	0903022	✓		x									
31	0904004	x							✓				
32	0904005	✓											
33	0904006												✓
34	0903023		✓		x							x	x

除剪報外，小組依據工友要求開展了多種與新聞傳播相關的活動，包括工友座談、與商業媒體記者見面、媒介史及新聞理論簡介等。經過多次集體實踐，新聞興趣組成員之間建立互信合作關係，但活動中也存在問題，特別是人員流動帶來的挑戰。

由於金融危機影響，加上工業區人口流動性本來就高，所以只有一位工友和一位X中心工作人員始終堅持參加工民新聞活動。其他成員有的因為興趣轉移，更多人因為工廠搬遷或換工作而無法堅持參加。另外，由於工友個人經歷不同，小組又強調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經歷發表意見，因此有時工友之間會發生較激烈的爭論，比如如何打官司、要不要仲裁，又如對同性戀、民族矛盾的看法。然而，表達不同意見之後，雖不一定達成一致，卻不影響大家日常的分工合作。

2009年底，小組開始「走出去」，開展屬於自己的新聞報導。大家不滿足於剪報，而希望做出更能為工友服務、更好的新聞。正是這段時間，小組更名為「南方兩週末新聞興趣組」，並將小組宗旨定為「讓工友了解真實的世界，讓真實的新聞為工友服務！」

該時期開展的一項主要活動是對龍城工傷康復醫院進行新聞調查。該活動延續了大半年，其中2010年春，四名中心工作人員參加了「工人MP3」的音訊節目製作培訓，其它工友也開始對音訊產生興趣。於是大家結合對工傷康復醫院進行的新聞調查製作「片花」（短小精悍、容易記憶的音訊節目），工民新聞實踐開始有了多媒體表達。

2010年中到2011年春，新聞興趣組活動走上軌道，活動形式基本穩定，雖然具體內容因成員興趣而有更新。同時由於城市建設商業化步伐加大，189工業區很多工廠先後關門，工人數量大幅下降，所以2011年「五一」X中心搬去深圳另一個有更多工人的社區。

11年5月搬家前後，中心對新聞興趣組進行調整，先將新聞興趣組和文學興趣組合並，原因是兩個小組主要都做文字工作，且由於工人數量減少，兩邊人數都已在下降。另外，由於黃秦等成員積極性非常高，在他們主導下，中心工作人員和留在189工業區的小組積極分子（「通訊員」）創立工民新聞刊物《工錄》，進一步實踐新聞興趣組的集體成果。可惜由於核心成員不久離開深圳，《工錄》只出版了兩期就停下來。

流動，是工業區的現實，是工人生活、工作，乃至生命的一部分。正因流動，在兩年多時間裏，「南方兩週末」新聞興趣組先後吸引了近30名工友參與活動。他們來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口音，從事不同工作，有着不同背景，對新聞的興趣卻是一致的。但也因為流動，我們被迫要停一停，想一想。總結經驗的同時，更要反省行動研究中的不足。

### 「工友眼中的金融危機」：對新聞發聲

第一次去X中心是2009年1月14日。還沒到189工業區，司機就迷路了，費半天勁才在離商業街不遠的一條橫街上找到地方。不起眼的地點，卻有明顯的標牌。還沒進屋，已看到一塊宣傳板上貼滿剪報，都是關於世界金融危機和工業區的報導。上面一條大標題：「金融風暴離我們有多遠？」

這些報導有關於減薪裁員的，有關於工廠倒閉或搬遷的，有關於社會保障的：「金融海嘯下的深圳蛻變」、「香港破產者落魄江湖」、「他們：還有那逝去的青春」。雖然金融危機首先發生在地球另一邊的紐約，但這些貼出來的剪報卻讓工業區的工友們看到自己如何受影響。

然而，這些報導畢竟還是主流媒體作品。工友們會留意它們，甚至仔細閱讀嗎？讀完以後，他們究竟如何看待、如何理解這些報導？庫德瑞(Nick Couldry)在研究全球金融危機時強調「發聲(voice)」既是重要過程，又是根本價值(2010, p. 1-2)。在工業區裏，能否讓工友們結合自身經歷，對新聞發聲？

正在思考的時候，中心一位工作人員說：「其實我們也想搞個工人剪報小組，但現在資源有限，不知道怎麼開展活動。」我馬上說：「我來給你們當義工，好嗎？」「好啊，歡迎！」

直到2010年中，金融危機對工業區的影響都是「南方兩週末」小組的討論重點。特別在小組活動頭半年裏，它是大家關注的焦點。正因此，修改剪報分類時，大家一致要求把金融危機列為第二大類，僅次於法律法規和維權個案。一來參與小組活動的所有工友都受到金融危機影響，有的被減薪，有的換工作。大家對危機有切身感受，每次坐

下來，往往還沒開始剪報，已在邊聊近況，邊商量如何應對危機。二來報刊中隨處可見涉及金融危機的報導，大家有感而發，討論更加熱烈。特別是有指標意義的個案，如因拿不到工傷賠償，刺死台商的五金廠工人劉漢黃事件、因被裁員與人事部經理同歸於盡的珠寶廠工人何金喜事件等。這些新聞事件牽動大家的情感與思緒，因為我們中就有工傷者，就有被不合理辭退的工人。

而且，往往越是重大事件或重大政策調整，就越會有多家報刊同時報導，讓大家可以比較報導手法的異同，對報導效果發表看法。通過反覆比較，大家發現，各報在報導上存在顯著差別。有的完全不報，有的輕描淡寫，有的帶着偏見，有的深入全面。不但報刊間有差別，同一份報紙的不同記者也會不同。但總體而言，無論記者報得多好，從工友角度看都有意猶未盡的地方。經過多次討論，大家萌發了一起寫新聞評論的想法。

工友們都沒寫過新聞評論，且打工多年，不少人平時很少提筆，寫作相對困難。然而，受金融危機影響，開工不足，大家比較有時間參與活動。同時因為是自願參加，要犧牲週末休息時間，因此剪報組的工友至少喜歡看報，喜歡討論，且有工友正在處理自己的勞資糾紛個案，迫切希望提高寫作分析能力。

我們強調工友們寫評論就像平時口頭討論事情一樣，先寫看到了甚麼新聞，在哪裏看到，新聞反映出甚麼問題，有甚麼價值，特別對189工業區的工友有怎樣借鑒意義。我們鼓勵大家把自己工作生活的經歷和平時的想法帶進來，再和大家討論，最後作品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享受自己發聲、集體討論和修改的全過程。

圖四是工友老張進行新聞評論練習的初稿。老張在南方打工十多年，喜歡看報，但不太說話。剛參加活動時，他以聽為主，有時發言會臉紅，但他剪的報導和他的觀點，常能引起大家共鳴。圖四評論就是老張在廣東省工會下屬的《南方工報》上看到文章，再結合附近工廠借機減薪，破壞勞資互信，所發表的議論。經集體討論，初稿先在小組內部進行修改，再經過X中心刊物《工友天地》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也多為工友）進一步潤色，最後發表出來是圖五的版本。

圖四 工友進行新聞評論練習的初稿

東莞的企业困难时期和东莞日本先锋集团的百音电子有限公司  
企业的痛苦告诉了员工，企业现在遇到困难的实情，提出企业困难时期  
与企业共进退，共度难关的号召，员工也很理解企业，积极签名回  
应与企业共进退，共度难关的号召，自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有企业  
开始作伪证，金融危机下，更多的企业借这大机会，给员工降薪了还  
做伪证，签两张工资单，一张假的，一张真的，这是企业与员工共  
进退，与员工算账相见吗？

圖五 發表在《工友天地》上的「工友眼中的金融危機報導」節選

#### 企業與員工共進退

金融危機以來，東莞百音電子廠明確告訴員工企業困難的實情，提出企業在困難時期與員工共進退、共度難關的號召。員工也很理解企業，積極簽名回應。這是《南方工報》2009年4月27日記者黃雄的報導。

我們平時聽得更多的是叫工人與企業共進退，而且一般只有退沒有進，可說是「有福不同享，有難得同當」。這次百音廠先主動進行溝通，然後工友簽名回應，和其它廠的高壓手段有些不同。希望這樣的結果是工友得到應有的尊重，同時建立起更好的勞資關係。我們觀察到的現實情況是，自從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就有企業開始損害勞資互信。金融危機後，更多企業不但借機降薪，而且還做偽證。一種常見做法是要員工簽兩張工資單，一張假的，一張真的。這是企業與員工共進退，與工友們真誠相見嗎？

工人都是講道理的。希望廠方以後也能有福同享，才能有難



同當。共進退應當以尊重工友為前提，以增進勞資互信為目標，並且增加工友在工廠管理中的民主參與。這樣的共進退才有意義。

開展「工友眼中的金融危機」新聞評論，最大收穫是工友們不再將新聞報導看成神秘的東西，也就是弗萊雷強調的「去神秘化」過程（弗萊雷，2001：79-81）。工友們通過自身實踐認識到，新聞其實是一種勞動生產過程，與大家平時從事的體力勞動沒有本質不同。只是需要大家一方面繼續鍛煉文字能力，一方面重新重視自己的日常體驗，進行集體討論、集體修改、集體創作。上面從圖四初稿到圖五定稿所加入的內容，例如「有福不同享，有難得同當」，就是另一位工友志民參與討論時發出的感慨。此外還有多篇其它工友寫的新聞評論，其中不乏針對老闆、地方政策和媒體報導的批評內容。

2010年開春以後，金融危機影響日漸消除，報刊裏再難看到相關報導。大家又回到從前忙碌的日子，這樣的新聞評論也就沒再進行。然而，工友們已經開始習慣對新聞發聲。他們不再滿足於被動消費主流媒體報導，而是能夠結合自身經歷，分辨媒體的良莠不齊。

### 龍城醫院工傷康復服務：「工民新聞」報導

新聞評論練習開始不久，大家提出主流媒體報導的種種問題，如報喜不報憂、以偏概全、甚至完全偏離現實。一次討論中，工友老牛說：「報上時不時報導民警照顧孤寡老人，幫他們買米、打水。但我們這裏滿街小偷、搶劫，怎麼不管？報導那些？大家心裏清楚，是『做秀』！」。

這樣的討論多了，報刊公信力下降，工友們看到較正面的新聞，往往第一反映是懷疑：真有這麼好嗎？就算事情是真的，記者報導也常帶有對工人的偏見，或是線條太粗，不能提供工友需要的有用信息。比如中心工作人員老潘就說：「沒甚麼這一行的記者和那一行的記者，都是籠統的。他們雖然報我們工人的事，但根本不了解裏面的苦難。就算好點的，還是會在報導裏挖苦你兩句。差的就更不用說了。」

2009年7月，工友在《深圳特區報》和《晶報》（深圳特區報業集團

下屬商業化都市報)中剪出類似報導，同時介紹離189工業區不遠的龍城醫院開始為工傷出院工友提供康復治療，費用由社保承擔。《特區報》報導較長，讀起來好像政府文件；《晶報》是豆腐塊文章，工友說「看了好像沒看」。

然而，兩篇報導卻牽動大家的神經，因為我們中就有工傷工友，X中心也有工傷探訪小組，定期去工業區醫院走訪，給工傷患者提供法規知識、信息諮詢和文化生活。看過兩篇語焉不詳的報導，大家一方面感覺都不了解工傷康復到底是怎麼回事，一方面也懷疑這個報導的真實性。

那天參加討論的有位從東莞過來的實習生，她是唯一接觸過康復治療的人。據她介紹，東莞已有兩家工傷康復機構，辦得都還行。工傷工友在一般醫院治療期結束後，如果還沒完全恢復勞動能力，就應當接受康復治療，費用社保承擔。這麼一說大家就開始理解了，因為治療期一般較短，出院了沒恢復勞動能力的情況很常見。還有醫院因工傷病人太多，床位不夠，提早趕患者出院的。假如深圳也有免費的工傷康復醫院，對工傷工友肯定很有用。

討論了半天，大家對這則新聞還是將信將疑。正好老張去過龍城醫院，另一位因工傷失去右手的老潘也想去看看。於是兩人假扮幫朋友打聽，進行了小組首次「臥底」新聞調查。他們用一下午時間訪談了醫院保安、醫生和副院長。除了進行細緻觀察，還和那裏的康復患者聊天、交朋友，掌握了一手材料。

兩人在週末討論時分享了自己的觀察，大家討論覺得這是一項真正為工傷工友服務的好事，只是主流媒體報導缺乏工人視角，也缺乏工友可以使用的具體信息，如怎樣乘公交、如何進行資格審批和工傷鑒定、如何解決治療費用、康復期間是否有工資等。我們將這些有用資訊和《特區報》、《晶報》的基本信息放在一起，成為「南方兩週末」首篇工民新聞調查報導。

此後，新聞興趣組又利用假日回訪該醫院。2010年春，部分小組成員接受了「工人MP3」培訓，開始嘗試製作音頻。其中一項內容是製作「片花」，也就是短小精悍、易於記憶的音頻節目。中心工作人員和義工(包括非新聞興趣組的其他成員)於是在工民新聞報導的基礎上，

將信息進一步濃縮，成為片花文本。然後錄音剪輯成MP3檔，通過手機拷貝分發，也在集體活動上播放。

一般大眾媒體的調查報導是發掘屬於陰暗面的「壞事」（張志安，2010）。但「南方兩週末」卻通過走訪，把一條模模糊糊的報導變成具體的「好新聞」，為工傷工友提供實際可用的信息，不但彌補了大眾媒體報導的不足，且為地方政府政策進行宣傳。這打破了傳統「調查性報導」的條條框框，但卻是以現實情況為基礎，發揮基層工友主體性的「工民新聞」。

### 與商業媒體座談：「新聞剪客」？

「南方兩週末」的名字來自2009年11月29日的年度義工大會。那天參加活動的有60多人，多數沒參加過剪報，而是其它小組的義工。活動要每組畫圖向其它人介紹自己的小組。剛好有人帶了《南方週末》，《南週》又是大家討論較多的刊物，於是就把它報頭剪下來，中間加上個「兩」字，成為「南方兩週末」。這個我們自己覺得好玩的設計，其它組工友看了，都覺得很棒，於是成為小組正式名稱。

有點偶然的命名過程，折射出工民新聞和商業媒體之間的關係。那就是，小組活動內容常建基於大眾媒體報導，但不局限於傳統條條框框，而是有選擇的「拿來主義」。多年來，南方報系經常受抨擊，說它過於西化，叫它「漢奸」報系（《明報》，2011），也有批評它過分商業化，包括選擇性採用宣導式新聞和專業主義報導手法帶來的不公（Zhao, 2008）。然而長期以來，興趣組工友對這些批評不加理會。因為他們在自己實踐中，用剪報三準則（與工人相關、規模大或事情新），往往能從《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裏剪出更多他們認為有用的報導。所謂更多，當然是相對的，一方面對應深圳本地報紙，如《特區報》和《晶報》，另一方面對應全國性報紙，如《參考消息》。雖然這些「南」字頭的報刊中，能剪出來的也還是少數內容，但它們往往離工人生活更近，報導得也更深。

2010年年初，小組希望豐富集體活動，工友提出想和專業記者見面座談。我於是聯繫了一份南字頭報刊，邀請該報最受工友歡迎的一

位記者。她的報導大家剪出來最多，也最想和她對話。最終那位記者沒從廣州過來，但把該報駐深圳記者站的另一位李記者介紹給我們。8月8日下午，李記者來到X中心，有十二名工友參加，大家對和專業記者座談十分積極。然而，活動結果卻不那麼簡單。

李記者在這家報刊工作時間不長。但之前她在另一家市場報幹了幾年，所以比較了解商業媒體運作。她向大家介紹了選題、採訪、編輯等新聞生產環節。大家最感興趣的是她們如何報導工業區新聞。據李記者介紹，她們特別重視工業區新聞，表現在單位要求記者在基層「跑」新聞，而不像其它報刊那樣用通稿或只做電話訪問。而且，雖然當地政府為駐地記者準備了條件不錯的宿舍樓，其它報刊都派人進駐，她卻在另外地方自己租房，因為她的報社要求和當地政府保持距離，保證報導公正性。

聽到這裏，很多工友眼中流露出景仰的眼光。有人直到活動結束後還不斷向李記者介紹自己的勞資糾紛個案，希望得到公正報導。她回答「以後聯繫」。以後，雖然在工業區其他活動中，工友們還見過李記者，她也還為當地打工文化活動寫過報導，但再沒來過工民新聞小組。向她提供個案的工友雖多次打電話跟進，最後也以失望告終。

過了幾星期，突然收到李記者電話，說第二天要發關於新聞興趣組的報導，請我看稿。當時我在國外，沒法上網，看到時文章已經發表。和工友們討論，大家對這篇題為「新聞剪客」的報導各有評價，其中負面意見為主。首先，文章以小組討論一篇「保安姦殺女工」的新聞做開篇，且在摘要部分對姦殺做強調處理。而8月8日大家並未主要討論這則新聞，即使有所提及，也是對其進行批評。但這篇報導省掉批評意見，用工友黃秦的話說是「背離了我們的立場」。處理明顯出於商業目的。

其次，文章裏有基本事實錯誤，比如人名、性別、引言有不正確的地方。據X中心工作人員反映，李記者只來過一次。對新聞興趣組背景並未了解清楚，所以可能出現筆誤及憑模糊印象寫作。而且她來主要是給大家分享商業報刊運作情況，而不是來報導我們，因此並未仔細了解小組情況。

第三，也是最嚴重的問題，是整篇報導採用獵奇角度看待小組活

動。其基本假設是，工人眼界狹窄，文化水準低，因此工人們居然可以開展剪報活動，居然有系統的分類體系，居然還寫評論、做調查。小組活動的結果是讓人「很難猜到他們的身份是流水線上的工人」。這樣的報導表面看是工人新聞，背後的價值觀卻是商業社會看不起工人的那套舊觀念。難怪小組討論時工友們說這篇文章「角度不對」、是「佔版面的」，「反映少數人利益，沒有考慮我們普通群眾」。

討論中我們再次回到新聞生產也是流水線這個比喻，向大家說明，李記者只是流水線上的一個崗位，改稿還有編輯，甚麼時間出版也不由她說了算，而要受制於商業媒體運作的大結構。比如過分強調姦殺的處理手法可能出自改稿編輯之手，而非記者本人。最後大家結論是，商業媒體也存在各種問題。要想做到「讓工友了解真實的世界，讓真實的新聞為工友服務」，光靠商業媒體是不行的，還是要靠工友自己。

### 《工錄》的試驗

2011年「五一」，X中心告別紮根八年的189工業區，遷往深圳寶安區石岩街道。搬遷主要由於郊區城市化程度加深，租金上漲，189工業區的工廠先後搬走，工人數量顯著下降。搬家前一個月，「南方兩週末」新聞興趣組和文學興趣組的成員們共同商定，留在189工業區的義工們將一起出一份屬於工人自己的報紙。原因是主流媒體較少報導打工者，就算有一般也是負面內容，因此需要「辦我們工人自己的報紙，為工人自己服務，發出工人的聲音」（《工錄》第2期卷首語）。

大家想了十多個報紙名稱，但都不滿意。不知誰說了一句：「我們打工的經歷不就是一條心酸的路嗎？《工路》怎麼樣？」經過討論，將「路」改為「錄」。《工錄》的名字有三層含義：「一方面是紀錄工人的歷史，這些歷史是鮮活而真實的；另一方面體現出工人的主體性，是工人角度的紀錄和解說；再者，紀錄工人走過的路，探索工人未來的路。魯迅先生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工錄》第1期卷首語）。

《工錄》第1期於2011年4月底問世，共四版，多數內容選編自主流媒體，包括頭版來自《南方週末》的「民工荒真相調查」、三版《文匯報》

的「『毒蘋果』是怎麼長成的」、四版《南方都市報》的「深圳月薪1320元職工免繳住房公積金」(附新聞評論)。二版主要是工人詩歌「打工心情」和「社區新聞：春運回家圖片展」，另外還有摘自「南方網」和微博的內容。

2011年8月出版第2期《工錄》，裏面以原創內容為主，包括頭版的專題分析「工人價值」、二版的「社區新聞：寫在X中心離開之後」、二版的「打工心情：命運(散文)」及「漂泊詩語」、三版的「重D音琴行開張啦!」、四版的「用人單位不准勞動者辭工怎麼辦?」。摘自主流媒體的內容相應減少，只有三版和四版上引自《工人日報》、《新華網》的少數內容。

比較兩期《工錄》可看出工民新聞主體性加強，及對主流媒體依賴減弱。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90後」工友黃秦，他參加「南方兩週末」活動一年半，對工民新聞活動特別熱心，是興趣組重點培養的「通訊員」。兩期《工錄》的多篇報導均由他完成，兩篇「卷首語」也有他的深度參與。

2011年9月，由於家裏需要，黃秦不得不離開深圳。其他編委也因換工作等原因難以繼續參與《工錄》活動。於是，報紙只出版了兩期，就停下來。此次工民新聞試驗為期不到半年，但值得強調的是，《工錄》的出版，筆者或其他來自大學的研究者完全沒有參與，全靠黃秦這樣的工人義工完成採訪寫作，只有X中心一位工作人員參與編輯和協助印刷發行。如此獨立出版的兩期《工錄》恐怕是本項參與行動研究最意想不到的傳播賦權成果。

## 發現與反思

回到此參與行動研究項目的起點，「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小組成員在批判媒介素養和發展新聞學實踐兩方面均得到進展。然而，賦權效果總體仍很有限。它不但受宏觀經濟社會條件和人口流動的影響，而且受到不同性別、不同背景的制約。其結果不但反映在個體效果的差異上，更影響整個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反思兩年多的實踐，項目重點主要放在參與行動和批判媒介素養上，對傳播賦權效果的目標有些

重視不夠。如能在小組運行過程中提早討論賦權目標，而非等到X中心搬遷時才進行此方面討論，相信應可取得更好賦權效果。此乃本項目主要研究限制之一。

此外，一項重要發現是，雖然「南方兩週末」活動沒有採用新聞學教材，但工友們從工業區日常體驗出發，經小組討論，認識到主要的新聞價值判斷標準，如客觀性、公正性、與工人群體的關聯度。大家將抽象知識結合到具體行動中，無論是剪報、歸類，還是寫評論、做調查報導。通過實踐，大家不再把新聞看做神秘的東西，而是人人都可參與，有「工序」可循的集體勞動過程。處理得好，會產生實實在在的勞動成果；處理得不好，會造成各種問題，如新聞「說假話」，又如用偏見的眼光進行選擇性報導。

小組活動提高大家對新聞的敏感度，除了怎麼理解新聞，也包括怎麼通過流覽標題、版面和基本內容，有效且快速地從工人視角對新聞報導進行過濾和分析。通過定期小組討論及不定期的寫作練習，工友們的口頭與書面表達能力均有相當提升。部分工友學習和使用錄音機、數碼相機、電腦等進行多媒體採編。雖然由於客觀條件限制，像「龍城工傷康復治療片花」這樣的多媒體成果還不多，而且製作還主要依靠X中心工作人員。因此，新媒體影響並不大，小組活動仍主要是基於報刊印刷媒體的面對面交談，這與強調網路新媒體力量的公民新聞運動有相當差別(Gillmor, 2004；葉蔭聰，2011)。

客觀限制一方面指多媒體硬體條件有限：雖然每位工友都有手機，少數工友甚至有筆記本電腦，但其配置都比較低，達不到製作多媒體內容的要求。所以即使有這方面的實驗，也需依賴X中心乃至筆者配置較高的電腦完成編輯。更重要的客觀限制是工人的時間。除了金融危機之後的2009年上半年，大部份時間工友都很忙。一個月能休息3天已算不錯。除了正常工作、超時加班、和處理個人或家庭事務以外，自己能支配的時間往往所剩無幾。完成平時剪報和兩週一次的討論也需要擠時間，再要大家學新軟體及編輯自己的多媒體內容，確實有相當難度。哪怕讓大家動筆寫評論、寫新聞其實也不容易。工廠工作時間太長、不加班難以養家糊口，如此缺乏公正的政治經濟結構給工人帶來生活重壓，這是比媒體技術條件更根本的制約因素。

本專案重視工人主體性，不將工友看成單純的「消費者」，也不將他們僅當作媒介再現的客體。借用打工文化團體的說法，工人過去是「被文化」的(溫鐵軍、劉湘波，2010：33)，我們則可以說，工人從前是「被新聞」、「被媒體」的。而通過參與式行動研究，在草根勞工組織平台上，我們嘗試建構工友作為新聞生產者、新聞評審員、媒介擁有者、傳播創造者的多重身份。結果參與人員的主體性也得到加強：工人和新聞媒體之間的關係超越傳統的提供與消費、報導與被報導關係，變得多元、互動。用工友志民的話說，就是可以不依賴別人，「提升自生力」。

這樣的主體性絕非來自外部，雖然大學研究人員的介入在項目中可能是必要條件，但它一定不足夠。比外部參與重要得多的因素包括X中心的組織平台、此平台上生機勃勃的新工人文化活動、珠三角地區長年積累的打工文學傳統，以及每位工友在工業區的生命體驗。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心工作人員寶麗，兩年來一直是她負責聯絡工友，協調小組活動。當然，最重要的是大家平等參與，定期討論，然後集體行動，並能不斷取得成果。從改進編碼分類系統到寫作新聞評論，從進行工民新聞調查到多媒體製作，這裏採用的最根本的工作方法是「對話式傳播賦權」(dialogic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 (Rogers & Singhal, 2003)，在台灣的公民新聞和民眾教育運動中也叫「鄉民教鄉民」(管中祥、陳雅萱，2011)。

進入這種狀態後，大學研究人員身份被在地化，如有工友就按工業區的習慣稱筆者為「師傅」。該稱謂不再將研究者看成外人，而是看做共同的勞動者、協作者，乃至朋友間的尊稱。筆者還有另一個在地化身份，就是X中心的「義工」。這些身份，加上參與式行動研究法，讓筆者有機會透過仔細聆聽和直接觀察發現工友及工人組織的需求，並通過持續參與，為大家解決問題創造促進條件。

除了小組內部關係，工民新聞進展比較順利還得益於中心的其它相關活動，包括文學興趣組、攝影興趣組、內部出版物，也包括法律法規小組、工傷探訪小組等。這些相關活動開展的時間都比新聞興趣組更早，因此在具體工作內容和組織工人的方式方法上，都為「南方兩週末」做了十分有益的準備。同時，工民新聞也為中心的其它工作創造



有利條件，比如法律法規小組可以更方便地查找過往資料、工傷探訪組可以更全面地介紹康復治療醫院等。總之，工民新聞日益與中心各項活動結成有機整體，因為它們都是工友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都和工業區的具體問題息息相關。

如前所述，在工業區開展活動最大困難是流動。工人是流動的，工廠是流動的，工人組織隔段時間也隨大環境改變而流動。「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但當營盤也缺乏穩定性怎麼辦？一種方案是用互聯網、手機保持聯絡，但普通工友有的不上網，大家雖有手機但手機一般只能做簡單協調工作，無法替代面對面的深入交流。

此外，社會性別差異也是一大局限。男多女少是X中心各種活動普遍面臨的問題，雖然189工業區女工比例並不低。具體到新聞興趣組，兩年下來堅持時間比較長、參加活動積極性比較高的，一般都是年齡較大的男工。年齡大一點的女工極少參加小組活動。雖然也有好幾位20歲左右的年輕女工參加，但時間一般不長。這有客觀原因，因為女工要處理更多個人事務，特別是有家、有小孩的，也有主觀原因，如害怕男工多的地方、家裏不支持等。兩年時間裏，小組也想方設法吸收女工，如加強宣傳招募，讓新聞興趣組的寶麗同時負責協調姐妹小組等，但成效有限。

其實，如何吸引更多人還不是最根本的問題，關鍵是如何保持大家興趣和對小組活動的「熱愛度」（此語出自黃秦）。實踐中發掘的答案一是要採取更生動的形式，讓討論更活躍、讓活動更多樣，而不光剪報；二是要發掘更有用的內容，讓小組參與者和中心其它工友能從工民新聞活動中有所獲益，帮助大家解決工作生活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如就業、福利、工傷。

## 結語

兩年零一個月，不長也不短。「南方兩週末」新聞興趣組經過摸索，發展出建基於批判媒介素養和發展新聞學的參與式行動研究項目，和屬於工友的「工民新聞」實踐。總結經驗教訓，可歸納為以下四點基本原則，供未來類似活動參考：

一、以人而非媒體為中心。新聞傳播研究者容易先入為主，以媒體形態為邊界畫地為牢。甲做報紙，乙做電視，丙做手機。其實工人並不受這些條條框框限制，而是甚麼有用用甚麼，不同媒體形態之間的區分相當模糊。包括不經媒體仲介的面對面傳播，仍是工業區信息交流與情感分享的重要渠道。因此開展工民新聞活動必須定期與工友見面，大家建立起長期合作的人際關係。該關係不受媒體形態制約。

二、從在地傳播需求出發。以人為中心就要首先善於發現工友的傳播需求。一般而言，需求可通過個人及群體組織兩各層面進行表達。工友個人的表達能力往往有相當差異，研究者必須學會用心觀察、耐心傾聽，拋開自身偏見，才能發現個體需求。同時，工友組織表達需求一般較清晰，比如在189工業區開展工人新聞相關活動，就是X中心主動提出的。而在實際工作中，工友需求多集中在法律法規、職業安全健康、城市生活等方面，這些內容在剪報分類系統的建立過程中將得到體現。

三、實踐中調整行動方案。參與式行動研究發生於具體的工業區場景裏，新聞興趣組只是眾多工友活動之一。它會和其它活動、其它變化發生聯繫，包括正面互動，如該中心已有的文學小組、攝影小組及定期出版物，均對開展新聞活動有很大幫助。但也有負面制約，如全球金融危機、工人流動性高、女工參加人數下降。這些影響有的可預見，有的不可預見。因此必須保持活動安排上的靈活性。體現在本項目中，最明顯就是小組名稱由最初的「剪報組」改為「新聞興趣組」，原因是工友們越來越希望不光剪報，而且能夠評報、改報，進行屬於自己的工民新聞實踐。

四、多方面評估賦權效果。基於以人為中心的原則，專案不限於關注新聞媒介如何為工人賦權，而應道更注意整個傳播過程的賦權效果。從媒介賦權到傳播賦權，不但將人際傳播納入觀察範圍，更可區分不同對象的賦權效果，如工友組織與工友個人之間、不同性別不同背景的工友之間，賦權效果就存在差異。同樣重要的是，研究者本身也是賦權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帶着學校的理論方法，往往不知道怎麼用才能解決問題。通過與「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興趣組成員長期互動，平等交流，讓新聞的知識和技能從工人中產生，為工人服

務，這同時也是對參與式研究者的重要賦權。

本次行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屬初步探索性質，在項目設計，特別是科學評估方面，還有很多改進空間。項目執行期間受到打工者人口流動性高、內部差異大、工友缺乏自由支配的時間等諸多因素限制，更深層原因是以出口為主導的工業區因全球經濟危機被迫轉型，工廠大規模搬遷，導致包括X中心搬家在內的結構性變化。未來研究如希望長期開展，並對其效果進行系統評估，可能可以考慮選擇流動性相對較低的群體，如家政工、環衛工，也可考慮在內陸城市，包括中小城市開展類似項目，因其受外部因素影響較小。

項目開始初期，經常有人提醒筆者需要提防內地有關部門打壓。該限制條件確實應當考慮在內。但回顧兩年多的具體實施過程，更重要的是，本項目從未直接受到官方限制，每次都如期舉行，在選題、組織形式、活動內容、發佈形式等方面享有充分自主。雖然從側面筆者了解到，有關方面曾經關注此項目活動，但他們並未設置障礙。所以，未來開展類似的傳播賦權項目，不應先驗地認為政府一定會反對。相反，「工民新聞」也可幫助工人了解政府惠民政策，如針對工傷康復服務的調查報導。

前文提到本項目面臨的客觀限制條件之一是底層民眾和社會組織在媒體製作方面硬體資源有限。2013年以來，筆者在走訪深圳、東莞其他工業區期間注意到，普通工人已開始擁有高配置的手機電腦，應當不久他們就將擁有自行編輯多媒體內容的技術條件。雖然技術門檻不一定會完全消失，但摸索新型網路條件下如何最有效、最便捷地讓工人群體參與多媒體生產與流通，發展屬於工友的網路媒介素養，這仍應為未來研究重點之一。

「南方兩週末」的「工民新聞」實踐，其賦權效果和社會影響雖初見端倪，但依然十分有限。其主要價值仍局限在如何運用參與式行動研究，在社會草根群體中開展媒介素養和新聞教育的實踐方法層面。至於項目評估方法則遠不夠系統，項目評估方面主要依賴現場觀察和與參與者面談（包括一對一採訪和焦點組）的傳統形式。未來可考慮更精確地測量項目帶來的變化，包括採用量化手段，如國外學者採用問卷調查和半實驗設計，再輔以質化方法，對烏干達傳播發展基金會的性

別平等項目進行系統評估(Underwood, et al., 2011)。具體可針對新聞興趣組內部的賦權效果、「工民新聞」實踐者與主流商業報刊的關係、其他工友對項目的看法等。最好儘早進行量表設計和數據蒐集，減少突發事件可能帶來的影響。假以時日，有進一步積累之後，也可對剪報內容本身和工友創作的報導及評論進行內容分析。分析框架可考慮在學者依發展傳播學理論進行設計的基礎上，也請「工民新聞」實踐者參與討論。讓參與式方法更進一步，不光為行動研究服務，也成為科研設計的有機組成部分。

## 附錄

新聞興趣組參與人員簡介及活動分工(除寶麗及筆者外其餘為假名)

寶麗，女，始終參加，X中心工作人員，福建(曾在電子廠)，負責《南週》、《中國婦女報》

老張，男，始終參加，塑膠廠工人後多次換工作，江西，《參考消息》、《南方工報》

志民，男，第一年參加，玻璃廠工，湖北，《南都》、《晶報》

老牛，男，第一年下半年開始始終參加，玻璃廠工人，湖南，《深圳特區報》

老潘，男，第一年參加，X中心工作人員，廣西(曾在五金廠)，負責《安全生產報》、《南都》

黃秦，男，後一年半參加，玩具廠工人後換到印刷廠，湖南，《南都》

小陳，男，第一年參加，印刷廠工人，湖南，《中青報》、《深圳特區報》

小潘，男，前半年參加，塑膠廠工人，湖南，《南方週末》、《南方工報》

小王，女，中間半年參加，電子廠工人，湖北，《南都》

小邊，男，中間半年參加，運輸工人，江西，《南都》

小呂，男，中間半年參加，玻璃廠工人，河南，《安全生產報》、《晶報》

小曾，女，中間半年參加，電子廠工人，湖北，《南都》

阿海，男，中間一年參加，玻璃廠工人，甘肅，《晶報》

老田，男，中間一年參加，塑膠廠工人，湖南，《深圳特區報》

- 老匡，男，中間半年參加，五金廠工人，陝西，《晶報》
- 小郭，男，中間半年參加，多次換工作，廣東，《晶報》
- 少華，男，中間一年參加，玩具廠工人，陝西，《晶報》
- 韋玉，男，中間一年參加，電子廠工人，湖南，未負責具體報紙
- 小何，男，中間半年參加，玻璃廠工人，湖北，未負責具體報紙
- 小軒，男，中間兩個月參加，印刷廠工人，河南，未負責具體報紙
- 老范，男，中間兩個月參加，多次換工作，雲南，未負責具體報紙
- 會清，男，中間兩個月參加，保險業務員，湖南，未負責具體報紙
- 責閑，男，中間兩個月參加，玻璃廠工人，湖南，未負責具體報紙
- 小馬，男，中間一個月參加，電工，山東，未負責具體報紙
- 小蘇，女，中間一個月參加，社會學專業實習生，未負責具體報紙
- 小譚，女，中間一個月參加，社會工作專業實習生，未負責具體報紙
- 海燕，女，中間一個月參加，社會工作專業實習生，未負責具體報紙
- 尹奕，女，中間一個月參加，社會工作專業實習生，未負責具體報紙
- 小浙，男，第二年參加，新聞傳播專業學生，未負責具體報紙
- 筆者，男，始終參加，新聞傳播專業老師，未負責具體報紙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明報》(2011年11月20日)。〈左派怒燒南方報系刊物〉，第A20版。
- Mingbao (2011, November 20). Zuopai nushao nanfang baoxi kanwu. p. A20.
- 卜衛(2010a)。〈民族誌教學：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參與式傳播為例〉。《新聞學研究》，第102期，頁229–251。
- Bu Wei (2010a). Minzuzhi jiaoxue: Yi “Diyijie dagong wenhua yishujie” de canyushi chuanbo weili. *Xinwenxue yanjiu*, 102, 229–251.
- 卜衛(2010b)。〈促進實現工人的文化權利——以北京新工人文化藝術節為例〉。《中國黨政幹部論壇》，第9期，頁35–36。
- Bu Wei (2010b). Cujin shixian gongren de wenhua quanli — yi Beijing xin’gongren wenhua yishujie weili. *Zhongguo dangzheng ganbu luntan*, 9, 35–36.
- 王洪喆、邱林川 (forthcoming)。〈新老工人階級文化空間的比較研究〉。《傳播、文化與政治》，第1期。

- Wang Hongzhe, Qiu Linchuan (forthcoming). Xinlao gongren jieji wenhua kongjian de bijiao yanjiu. *Chuanbo, wenhua yu zhengzhi*, 1.
- 王維佳(2011)。《作為勞動的傳播》。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Wang Weijia (2011). *Zuowei laodong de chuanbo*.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 成露茜、羅曉南(編)(2005)。《批判的媒體識讀》。台北：正中書店。
- Cheng Luxi, Luo Xiaonan (Eds). (2005). *Pipan de meiti jiedu*. Taipei: Zhengzhong shudian.
- 朱健剛(2007)。〈國際NGO與中國地方治理：以珠三角為例〉。《開放時代》，第5期，頁34-49。
- Zhu Jiangan (2007). Guoji NGO yu zhongguo difang zhili: Yi zhusanjiao weili. *Kaifang shidai*, 5, 34-49.
- 李培林、田豐(2011)。〈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態度和行為選擇〉。《社會》，第3期，頁1-23。
- Li Peilin, Tian Feng (2011). Zhongguo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Shehui taidu he xingwei xuanze. *Shehui*, 3, 1-23.
- 周葆華、呂舒寧(2011)。〈上海市新生代農民工新媒體使用與評價的實證研究〉。《新聞大學》，第2期，頁145-150。
- Zhou Baohua, Lv Shuning (2011). Shanghai shi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xinmeiti shiyong yu pingjia de shizheng yanjiu. *Xinwen daxue*, 2, 145-150.
- 承鋼(2012)。〈鋼的琴：一曲傳統產業工人的挽歌〉。《電影文學》，第2期，頁117-118。
- Cheng Gang (2012). Gangdeqin: Yiqu chuantong chanye gongren de wange. *Dianying wenxue*, 2, 117-118.
- 林志彬、張立新(2008)。《打工者參與式行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Lin Zhibin, Zhang Lixin (2008). *Dagongzhe canyushi xingdong yanjiu*.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保羅·弗萊雷(2001)。《被壓迫者教育學》(30周年紀念版)(顧建新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Freire, P. [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 Baoluo Fulailei (2001). *Beiyapozhe jiaoyuxue* (30 zhounian jinianban) (Gu Jianxin et al. Trans.).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reire, P. [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 韋爾伯·施拉姆(1990)。《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金燕寧等譯)。北京：

- 華夏出版社。(原書 Schramm, W.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 Wei'erbo Shilamu (1990). *Dazhong chuanbo meijie yu shehui fazhan* (Jin Yanning et al.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Schramm, W. [1964].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 祝彥(2009)。《「救活農村」：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回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Zhu Yan (2009). “*Jiuhuo nongcun*”: *Min'guo xiangcun jianshe yundong huimou*.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 馬傑偉(2006)。《酒吧工廠：南中國城市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Ma Jiewei (2006). *Jiuba gongchang: Nanzhongguo chengshi wenhua yanjiu*.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 康美齡、謝曉霞(2011)。〈農民工：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遊弋〉。《電影文學》，第20期，頁94-95。
- Kang Meiling, Xie Xiaoxia (2011). *Nongmingong: Zai lixiang yu xianshi zhijian youyi*. *Dianying wenxue*, 20, 94-95.
- 張一文(2012)。《「打工文學」檢視》。香港：三聯書店。
- Zhang Yiwen (2012). “*Dagong wenxue*” *jianshi*. Xianggang: Sanlian shudian.
- 張志安(2010)。《潛入深海：深度報道30年幕後軌跡》。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 Zhang Zhi'an (2012). *Qianru shenhai: Shendubaodao 30 nian muhou guiiji*. Guangzhou: Nanfang ribao chubanshe.
- 曹越、劉慧丹(2006)。〈城市農民工對大眾傳媒中自我形象的認知：以南京市為例〉。張國良、趙凱、張宇丹(編)《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頁83-9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Cao Yue, Liu Huidan (2006). *Chengshi nongmingong dui dazhong chuanmei zhong ziwu xingxiang de renzhi: Yi Nanjingshi weili*. In Zhang Guoliang, Zhao Kai, & Zhang Yudan (Eds.), *Meijiehua shehui: Xianzhuang yu qushi* (pp. 83-91).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黃岩(2008)。〈增權與融合：農民工組織在社區和諧建設中的作用〉。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編)，《社區居民自治與社會組織創新》(頁228-234)。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Huang Yan (2008). *Zengquan yu ronghe: Nongmingong zuzhi zai shequ hexie*

- jianshe zhong de zuoyong. In Minzhengbu jiceng zhengquan he shequ jianshe si (Ed), *Shequ jumin zizhi yu shehui zuzhi chuanguan* (pp. 228–234).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chubanshe.
- 楊宏海(2007)。《打工文學備忘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Yang Honghai (2007). *Dagong wenxue beiwanglu*.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楊宏海(編)(2009)。《打工文學縱橫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Yang Honghai (Ed). (2007). *Dagong wenxue zonghengta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楊善華、朱偉志(2006)。〈手機：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動」選擇：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手機消費的文化和心態解讀〉。《廣東社會科學》，第2期，頁168–173。
- Yang Shanhua, Zhu Weizhi (2006). Shouji: Quanqiuhua Beijingxia de “zhudong” xuanze: Zhusanjiao diqu nongmingong shouji xiaofei de wenhua he xintai jiedu. *Guangdong shehui kexue*, 2, 168–173.
- 溫鐵軍、劉湘波(2010)。〈重建勞動文化，重塑勞動地位〉。《中國黨政幹部論壇》，第9期，頁33–34。
- Wen Tiejun, Liu Xiangbo (2010). Chongjian laodong wenhua, chongsu laodong diwei. *Zhongguo dangzheng ganbu luntan*, 9, 33–34.
- 葉蔭聰(2011)。《草根起義：從虛擬到現實》，香港：上書局。
- Ye Yincong (2011). *Caogen qiyi: Cong xuni dao xianshi*. Xianggang: Shangshuju.
- 管中祥、陳雅萱(2011年8月23日)。〈從糾正解讀媒體到培養公民記者〉。《雲南信息報》，頁A特02。
- Guan Zhongxiang, Chen Yaxuan (2011, August 23.). Cong jiuzheng jiedu meiti dao peiyang gongmin jizhe. *Yunnan xinxiabao*, A02.
- 劉忱(2010)。〈關注「打工文化」的力量〉。《中國黨政幹部論壇》，第9期，頁30–32。
- Liu Chen (2010). Guanzhu “dagongwenhua” de liliang. *Zhongguo dangzheng ganbu luntan*, 9, 30–32.
- 劉建華、潛偉(2006)。〈民國時期技術工人學校教育研究〉。《學術論壇》，第12期，頁153–157。
- Liu Jianhua, Qian Wei (2006). Minguo shiqi jishu gongren xuexiao jiaoyu yanjiu. *Xueshu luntan*, 12, 153–157.
- 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窮人的銀行家》(吳士宏譯)。北京：三聯書店。  
(原書Yunus, M. [2003]. *Banker to the poor: Micro-lending and the battle*



*against world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Mohanmode Younusi (2006). *Qiongren de yinhangjia* (Wu Shihong Tran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Yunus, M. [2003]. *Banker to the poor: Micro-lending and the battle against world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聶寬冕 (2010)。《關於春晚27年農民及農民工形象再現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未發表碩士論文。
- Nie Kuanmian (2010). *Guanyu chunwan 27 nian nongmin ji nongmingong xingxiang zaixian de yanjiu*.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weifabiao shuoshi lunwen.
- 羅鳴、張立偉 (編) (2010)。《中國發展新聞學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Luo Ming, Zhang Liwei (Eds.) (2010). *Zhongguo fazhan xinwenxue gailu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llan, S., & Thorsen, E. (Eds.) (2009). *Citizen journ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eter Lang.
- Brady, S. R., Schoeneman, A. C., & Sawyer, J. (2014). Critiquing and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neoliberalism on community organizing. *Journal of Social Action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logy*, 6(1), 36–60.
- Couldry, N. (2010). *Why voice matters: Culture and politics after neoliberalism*. London: Sage.
- Downing, J.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ebastopol, CA: O'Reilly.
- Hearn, G., Tacchi, J., Foth, M., & Lennie, J. (2009). *Action research and new media: Concepts, methods and case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Kapoor, I. (2008). *The postcoloni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Qiu, J. L. (2008). Working-class ICTs, migrants, and empowerment in South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4), 333–347.
- Qiu, J. L., & Kim, Y. (2010). Recession or progression? Notes on media, labor, and youth from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630–648.
- Rogers, E., & Singhal, A. (2003).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In P. J. Kalbfleisch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7* (pp. 67–85).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 Servaes, J. (2008).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ew Delhi: Sage.

- Singhal, A., & Rogers, E. (1999). *Entertainment-education: 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r social change*.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 Sparks, C. (2007).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 Underwood, C., Brown, J., Sherard, D., Tushabe, B., & Abdur-Rahman, A. (2011). Reconstructing gender norms through ritual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African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2), 197–218.
- Unwin, T. (Ed.) (2009). *ICT4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本文引用格式

- 邱林川 (2015)。〈「南方兩週末」：工民新聞、批判媒介素養與傳播賦權〉。《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4期，頁151–184。